

国家能力、市场竞争和社会信念： 新中国70年来经济体制变革 过程的政治经济学解释

李康

内容提要：文章通过引入国家能力、市场竞争和社会信念等概念，为理解新中国70年来经济体制变革的演进路径、影响因素和内生动力提供了一个新的理论分析框架。分析发现，中国的制度变迁过程是在经济效率、政治权力和社会信念等多重逻辑的作用与互动中推进的，而具体对经济绩效的影响，受制于不同发展阶段所面临的制度环境以及执政者的意识形态偏好，国家采取了不同的经济体制和发展战略，改革开放前工业化的政治经济遗产成为改革开放后中国经济腾飞的历史逻辑起点。因此，“改革开放前后三十年的两个互相不否定”是正确理解新中国经济体制变革以及长期经济增长原因的关键所在。

关键词：国家能力 市场竞争 社会信念 制度变迁 经济增长

中图分类号：F064.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3947(2020)01-0159-11

2013年在新进中央委员会委员、候补委员学习贯彻党的十八大精神研讨班开班式上，习近平总书记深刻地指出，“不能用改革开放后的历史时期否定改革开放前的历史时期，也不能用改革开放前的历史时期否定改革开放后的历史时期”^①。那么，究竟该如何完整地理解新中国70年来的经济体制变革过程以及由此带来的长期经济增长？特别是在这70年的人类历史进程中，新中国从积贫积弱、百废待兴的“废墟”上重构政治经济社会秩序，人民的生活状况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在2010年成为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以至于经济学者称其为“中国经济奇迹”（林毅夫等，2013）。如何总结中国经济体制变革过程中的经验，概括出具有中国特色的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是摆在中国经济学人面前的一个时代命题，也是继续深化改革的实践需要。

一、引言

关于落后国家的经济增长历来存在不同的解释，早期的结构主义发展理论倡导实施工业化、重视资本积累和强调计划化，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大多数发展中国家也的确实行了结构主义的经济模式，如印度、中国和巴西等国家都是从发展重化工业开始的。格申克龙（2012）在广泛考察19世纪欧洲经济史和

作者简介：李康，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博士研究生。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攻关项目“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背景下的新型城乡关系研究”（项目编号：17ZDA067）。

感谢广州大学邓宏图教授和匿名审稿人的宝贵建议，文责自负。

^① 该论断首先见于《正确看待改革开放前后两个历史时期——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两个不能否定”的重要论述》（2013年11月8日《人民日报》第6版），而后于2016年4月收录于《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读本（2016年版）》，又于2019年4月1日刊载于《求是》上《关于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几个问题》一文中。

20世纪前苏联经济与社会问题的基础上,认为“在落后国家中,其实际的经济活动状态及现存的发展障碍与这种发展本身所固有的高期望值之间存在的‘紧张关系’,成为推动工业化发展的力量”。也就是说,那个时代的经济学家在总结落后国发展经验的基础上,普遍认为首先要解决工业基础问题,其次才出现经济起飞和增长的结果(见表1)。

表1:主要国家工业化战略比较

国别	体制	是否经过重工业	农村土地改革	重工业化周期
德国	资本主义	经过	改革容克地主	18年左右
日本	资本主义	经过	土地改正	14年
俄国(苏联)	计划经济	经过	彻底集体化	苏联17年+沙俄20年
印度	资本主义	经过	未土地改革	约35年
中国	社会主义	经过	彻底土地改革	28年
巴西	资本主义	经过但较为粗放	土地改革不彻底	前后30余年

虽然结构经济学倡导的工业发展路径成为那个时代各国发展的“理论参照”“政策纲领”和“实践(行动)方案”,但不同国家是通过不同的政治经济体制来实现的。对于工业化所需要的资本,俄国是通过政府强制性税收将收入由消费转向投资,而德国是通过建立与工业企业紧密相连的综合银行实现的(格申克龙 2012)。然而,当20世纪70年代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兴起时,诸多后发国家的经济转型转而开始响应该思潮,原有的理论体系被抛弃,原来的体制机制亦被束之高阁,这也就意味着,那些原先既选择了重工业战略并同时实行计划经济体制的国家,不仅要创新经济发展战略,还要实现政治经济体制转型,是双重转变,而非单向度演进。

然而,历史的吊诡之处恰在于此,当转型国家政策的关键思想来源和理论基石发生转变时,其原有的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和计划经济体制,以及由此建立的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亦受到严重质疑。主要原因是,以新自由主义经济学为政策选择的改革路径被人们定义为“华盛顿共识”,它们将不符合其理论预期的早期发展实践和后期的转型战略割裂甚至对立起来,忽视了历史与制度遗产在长期经济增长中的真实作用。也正是如此,国内主流经济学界在解释新中国70年来经济体制变革过程以及由此带来的长期经济增长时,对于新中国成立初期的重工业优先发展阶段,要么忽视其历史意义和长期影响,要么将其和改革开放后实行的比较优势发展战略直接对立起来,难以从整体上对中国的长期经济增长做出历史与逻辑相统一的解释。

因此,本文试图要回答的就是:改革开放前后两个时期之间的内在关联究竟是什么?又是什么促成了由新中国成立初期的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向改革开放后的比较优势战略的转型?这样的制度变革又是怎样导致中国长期的高速经济增长?

二、既有研究及其局限

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取代结构主义发展理论,不仅影响了众多转型国家的战略选择,也主导着学界对落后国家早期工业化历史的解释话语权。当下国内学者关于制度变迁对经济绩效的影响,提出的诸多解释性框架就带有明显的新自由主义经济学色彩,他们大多认为以改革开放为标志,中国从计划经济逐步过渡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中国经济得以腾飞的关键。吴敬琏、马国川(2013)指出“市场制度的建立解放了被制度束缚压制的生产力,是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原因”,同样是力促市场化改革的张维迎(2010)还强调“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几次大的经济发展,都与企业家群体的成长有关”。毋庸置疑,市场能够通过竞争性价格传递反映资源稀缺程度的信息,并由此创生出对当事人经济行为的强有力激励,但是市场机制的有效运行并不是在制度真空中进行的,而是需要相应的制度才能确保其市场效能的发挥,

苏联和东欧国家快速而彻底的自由化、私有化和市场化改革的失败案例已经充分证明了这一点。这也就是奥尔森(2005)一直追问的:市场几乎无处不在,但究竟是什么东西导致了市场经济国家有的变得富裕而有的却陷入贫困呢?林毅夫(2012)强调,除了市场化改革使中国能够根据要素禀赋结构所决定的比较优势来选择所要发展的产业和所要采用的技术外,政府也在这个过程中起到“增长甄别和因势利导”的积极作用。但该理论仍然存在对政治体制和法律制度等分析维度的缺位(韦森,2013),另外,该理论框架也存在分析逻辑起点的不彻底性,即忽视了对比较优势战略发挥作用的前提条件的分析,如贵州、四川、江西等多山省区的自然资源如果没有相应的交通条件和基础设施,如何能将这些具有比较优势的资源禀赋结构转化为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结构?由此可见,仅专注于市场化改革对中国经济增长的研究远远不够,我们还需要深入探究造成这种制度转变的内在原因及其作用机制。

从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直观上是资源配置方式发生了转变,但更重要的是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之间的权力分配格局也发生了重要变化。从以往中央政府统领一切经济资源和政策制定的决策权,到引入市场机制并下放部分权力到地方政府,加强了地方竞争,是分权促进了经济增长^①。其中,较为典型的理论框架是以钱颖一和许成纲等人代表提出的“中国特色的财政联邦主义”和周黎安提出的“官员晋升锦标赛体制”,前者认为不同于苏联的U型单一层次结构,中国的多地区、多层次的M型结构,使中央政府从20世纪80年代初期的行政性分权改革,结合财政包干制度,导致地方政府因财税激励而竞相发展本地经济(Qian et al., 2000、2006)。后者则聚焦于中国政府官员的个体激励和国家治理,认为地方官员为了政治晋升而在发展经济上相互竞争(周黎安,2007)。简单来说,与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强调的彻底而激进的市场化改革“把价格搞对”不同,上述解释中国增长之谜的理论框架还聚焦于“把激励搞对”,其中,“中国特色的财政联邦主义”是财税激励(财权),“官员晋升锦标赛体制”是个体激励(人事权)。以上理论在相当程度上揭示了分权与增长之间的本质联系,但问题在于,行政性分权与强化财政激励并非改革开放以后才有,白慧天、周黎安(2018)在对1955~1988年历史的梳理中发现,计划经济时期中央政府就曾多次将计划管理权、财政管理权、物资分配权以及其他经济管理权限同步下放给地方。同时,地方官员为了政治晋升而竞相发展本地经济的激励在计划经济时期也一直存在,20世纪50年代末各级政府官员为了提拔和升迁就存在“大搞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方面的激烈竞争(韦森,2017)。这两个时期共存的分权改革实践却产生了截然不同的经济表现,如何对此做出一致的解释?

无论是强调市场化制度变革的影响,还是注重中央与地方分权的作用,这两类分析范式都只是停留在分析改革开放后40年这一特定阶段,缺乏从新中国70年的全局性历史来考察中国的制度变迁和长期经济增长过程,导致此类研究更多的是归纳中国取得高速经济增长的制度特征,而缺乏对促成这种制度转变的动力机制以及如何能使这些经济政策或制度得到有效施行的阐释。因此,本文进一步追溯改革开放的历史逻辑起点,并构建起统一的理论框架,从而对新中国70年的经济体制变革过程做出历史与逻辑相统一的政治经济学解释。

三、制度环境、国家能力和社会信念:一个理解经济体制变迁过程的理论框架

在笔者看来,目前经济学界对中国经济体制变革前后两个时期的诸多现象难以做出历史与逻辑相一致的解释,根本原因在于,深受新古典经济学和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影响的经济学家总是以经济效率作为唯一标准来评价一项经济政策或者制度表现。殊不知,在功利主义哲学与新古典经济学的分析中,希望以经济效率统领一切,将市场经济脱嵌于社会的分析注定是一种理论的乌托邦(波兰尼,2017),中国的发展轨迹不是朝着西方发达经济体的理想态收敛,而是长期历史沿革下的政治经济文化的联合转型。

^① 张五常将之称为县域竞争(张五常,2009)。

因此,笔者试图同以新古典经济学为内核的分析框架进行理论对话,与它们单纯地强调“理性人”和“经济效率”不同,笔者采用的分析框架以“历史理性”^①为基本假设,强调“国家能力”和“社会信念”在制度变迁中的重要影响,结合新中国在不同发展阶段所面临的制度环境,考察在“经济效率”“政治权力”和“社会信念”等多重逻辑的作用与互动中经济体制变革的轨迹及其对经济绩效的影响,试图证明制度变迁既受制于制度环境的变化,也反映出执政者意识形态的更新,而具体对经济绩效的影响,既是国家能力的集中体现,也有市场机制的激励作用。

在诺思(2008)看来,制度是“人为设计出来构建政治的、经济的和互动的关系的约束,由非正式的约束(奖惩、禁忌、习俗、传统及行为准则)和正式的规则(宪法、法律、产权)组成”格雷夫(2008)则将制度视为“由规则、信念、规范和组织共同作用并导致(社会)行为秩序产生的一个系统”。无论对制度如何定义,可以发现制度的产生和有效实施都是在一定的时空环境下展开的,而一国或地区的制度选择往往会反映出特定时间节点的环境特征,一方面制度环境的改变会对原有的制度形成一定的冲击,另一方面既有的制度也会自主调试以适应相应的环境特征。马克思指出,“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并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下创造”(中央编译局编译,2012)。这就表明,制度演进的方向并非唯一的“经济效率决定论”而是“适应效率论”,尤其是一个国家的制度选择往往会考虑多维度的政策目标,如政权稳定、经济发展和社会和谐等。通常情况下,“适应效率论”往往也是为了经济效率的提高,所以二者大有可能重合,但不能因暂时的不符合效率特征,就否定既往的制度安排。然而,主流经济学界并未明确区分改革开放前后两个发展阶段的不同制度环境,也没有认清同一时期不同经济体面临的内外环境的差异,导致他们往往难以辩证地看待新中国在不同阶段的经济发展战略及其长期影响。

同时,制度的变迁和实施均离不开行为人的认知、信念和偏好,他们除了受寻利动机的驱动外,还受特定制度环境下的社会信念或意识形态的影响。从制度层面来说,社会信念是共有的,为相关所有者所认同,也可称此为意识形态。现代国家的形成除了历史疆域的限定、强制性暴力的垄断和国际地缘政治的博弈外,任何政体的延续都需要建立在相近的文化遗产、共享的道德准则以及一致的社会信念之上,意识形态作为一种信仰体系或者价值体系,本身就是从社会成员的交往中内生出来的,它能减少制度运行成本,或者直接构成制度体系的精神反映。当然,政治意识形态是会分层的,各类团体基于自身利益差别而构建出不同的“话语体系”,最终的社会信念就是不同话语体系博弈的产物,话语交集的多寡决定着不同阶层共享观念的公共空间,这个交集越大,这种话语体系或社会信念就越具有合法性基础,就越能团结人民。因此,真正的社会信念恰恰能够整合大多数人的合法权益和正义诉求。“许多东西依赖于特定社会中既定的行为规范,建立对社会有用的行为准则,并不是要把完全以自我为中心的人转变为完全利他的人,这是一个多目标行为焦点转变的问题”(阿玛蒂亚·森、让·德雷兹,2015)。以“历史理性”作为研究假设,正是承认了社会信念等要素对制度变革以及制度实施效果的影响,制度变迁过程同时也是社会信念发生转变的过程。改革开放前的社会主义建设既是一种物质生产过程,也是意识形态的塑造与信念重建过程,更有学者认为它是政治经济基本制度的构造与巩固过程。当然,无论是社会信念体系,还是政治经济制度,都不可能是一成不变的,随着时间的推移和环境(条件)的变化,它们也会

^①“历史理性”是本文原创的一个概念,它认为行为人的决策动机除了受成本—收益算计下的寻利动机影响外,还是历史演进中内生出的习俗惯例和社会信念等要素综合作用的结果。诚然,个体的行为决策会受到寻利动机的影响,但是“人的本质是社会关系的总和”,习俗惯例、道德伦理和社会信念等内生于历史长河中的因素,一方面会外化为社会行为规范,另一方面又会内化进人的心智结构,两者都会对人的行为选择产生影响。构建基于“历史理性”的政治经济学分析,从本质上来说是历史唯物主义的,从分析方法上看则能辨识出新的增长动力的历史逻辑起点与现实诸因素是如何联结在一起,并共同诱发了经济高速增长的引擎。就是说,即使产权明晰、市场取向、激励机制的重新塑造,以及不同地区政治锦标赛内在地推动了经济增长与社会转型,亦不能就此断言历史因素荡然无存,与此后的社会转型与长期经济增长毫无关系。因此,扩展“理性人”至“历史理性”,从人的认知过程、信念结构看待制度变迁,才更有可能构建起历史与逻辑相统一的理论框架,用来解释制度变迁与长期经济增长过程。相关的详尽阐述参见邓宏图、宋高燕:“评经济人‘理性’——历史理性的构建及其解释力”,《中国社会科学评价》2017年第2期。

逐渐调整,不断达到并尽量满足社会不同阶层政治与经济上的利益诉求。

最后,行为人的社会信念通常只是制度变迁的一个“推动力”,要顺利实现经济社会转型,还需要切实的“行动力”,相当的“国家能力”能保证一国不陷入转型陷阱。主要在于,被视为中国经济高速增长核心要件的市场化改革,在很大程度上需要一个稳定的政治组织,“东亚经济奇迹”和拉美与非洲国家的发展陷阱,已经让经济学者开始注意到国家能力对经济发展的重要意义。强大的国家能力不仅能保证市场经济条件下微观主体间合约的顺利执行并落实宏观意义上的既定政策目标,还能在长期的制度演进过程中保障社会稳定,“耗散”掉改革的组织成本。简单来说,“弱政府”往往容易在经济发展或社会转型中无法提供市场经济有效运行的基础性制度。在重工业优先发展阶段,由于工业化过程是在资源极度匮乏和技术条件落后的条件下展开的,为完成资本的内源性积累,建立起了从农业中汲取资源的配套制度,此时的国家能力就更多的表现为基层政治动员能力、经济资源整合能力和规划组织协调能力;一旦引入市场机制转入比较优势发展阶段,尤其是在经济高质量发展阶段,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着决定性作用,那么国家能力就不能仅局限于国家财政汲取能力,还在于国家法治治理能力,使中央和地方、政府和市场之间的权力和资源得到合理配置,从而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

于此,笔者构建起“制度环境—社会信念—国家能力”三位一体的分析框架来理解中国的经济体制变革过程。诺思(2013)指出:制度变迁的动力源在于参与人的意向性,而意向性是在一定的制度环境中人类的传统习俗、社会信念、经验习得和基因等内化为心智结构后的内在诠释(internal representation)。在笔者提出的分析框架中,制度环境和社会信念共同决定着行为人的策略选择,制度环境会限定行为人的策略集合或者“冲击”行为人使其做出反应,而社会信念在“历史理性”的分析前提下本身就构成了行为人的决策动机。但制度环境和社会信念也是相互联系的,一方面制度环境形塑了制度变迁的轨迹,是社会信念转变的反映,另一方面社会信念特征本身就构成了特定制度环境中的非正式规则,决定着制度实施的效果。制度规则的再生产过程就是在一定制度环境的约束下,可行空间拓展以及社会信念不断更新的过程,而且反过来,制度环境的变化和社会信念的刷新也影响着制度最终的实施效果。一旦制度规则被确定以后,良好的经济绩效不仅取决于市场机制的作用,提高资源配置效率,而且取决于国家能力作用下使基础性市场规则能够有效运行,经济持续增长的必要条件还需要使大多数人能从改革中看到并得到“好处”,这样还能尽量减少制度实施的运行成本甚至是制度变革产生的组织成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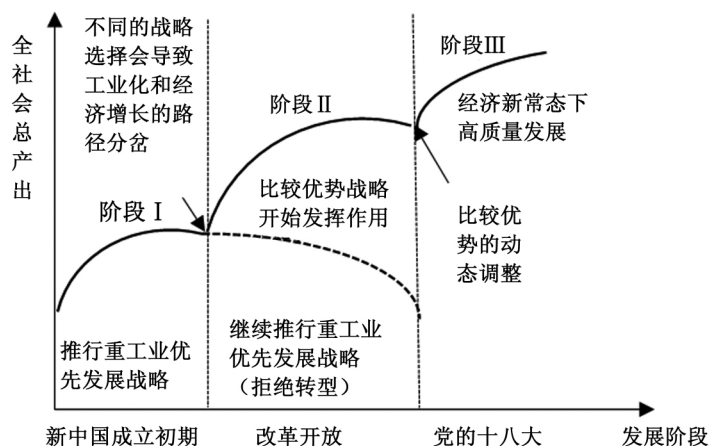
四、中国经济体制变革过程及其制度逻辑

好的理论分析框架不仅要能解释历史的一个片段,更应当能够解释前后相伴随的多个历史过程,而非人为地将历史进行分割,即理论分析应当从实际出发,用事实证伪理论,而不应当用理论裁剪事实。从新中国成立初期的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到改革开放后比较优势战略开始发挥作用、再到新时代条件下经济由高速增长转向高质量发展,均是特定时期的制度环境、国家能力和社会信念等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它们不仅在历史的时间序列里前后相依,而且也构成了事物发展的前因后果,因为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解决了比较优势发挥作用的贸易可得性问题,而经济高质量发展是比较优势从资源禀赋型向绿色创新型的优化升级(见图1)。

(一) 新中国成立初期的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与计划经济体制

1949年,在战争废墟上重建的新中国可谓是一穷二白,同时作为社会主义国家,还面临着来自美国等资本主义国家的威胁^①,冷战阴影下的朝鲜战争爆发更是加剧了地缘政治格局的动荡。于是,经过三

^① 截至1950年10月新中国成立1周年,仅有25个国家承认新中国,17个国家和新中国建立外交关系,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拒绝甚至阻挠其他国家承认新中国,在经济上对新中国实行封锁、禁运(陈甬军,2004)。



资料来源:笔者自制。

图1: 中国经济体制变革过程及其制度逻辑: 增长、拐点与转型

年的经济恢复期 随着 1953 年“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展开^①,如此的制度环境客观上驱使新中国选择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一方面重工业是大国长治久安的前提条件,它能提升国家的战争动员能力和国防实力,另一方面也是落后国经济发展的基础。霍夫曼(Hoffmann,1958)的研究表明工业化的发展程度是与重工业在工业结构中的比重相关的,较高的重工业比重标志着较高的经济发展水平。1955 年薄一波在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上明确地提出了这两方面的考虑,“为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和国防的现代化 根本改变我国经济上的落后和贫穷状况 必须将我国整个国民经济在现代工业技术的基础上加以改造 这就必须建立和发展我国的重工业”^②。

除了特殊历史时期的制度环境压力之外,民众对新生政权高度的意识形态认同也使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得以有效实施。因为工业化建设不仅仅是技术上的重大变革,也需要组织观念上的革新。中国共产党是按照马列主义原理组建的政党,其带有浓厚的共产主义的平等、自由和互助的社会理想,反对阶级剥削、追逐利润以及社会不平等,认为资本主义的劳动者和生产资料的分离最终会导致人的异化和社会的两极分化,而生产的社会性与资本主义私有制之间的矛盾又会导致周期性的经济危机,于是以阶级斗争、群众路线和互助合作等政治信息和象征符号感召广大群众积极参与社会重建和工业建设之中。全民以高度的政治觉悟和生产热情投入到工业化的发展之中。工人阶级一马当先,不断加强生产技术革新与劳动组织改进,深入开展增产节约劳动竞赛;广大农民通过总路线的宣传教育,认识到社会主义工业化将给农业发展带来广阔的前景,认识到要根本改善生活,抗御自然灾害,就要卖出余粮支援国家实现工业化;高等学校和各类专业技术学校的大批毕业生无条件地服从国家分配,奔赴祖国各地的工厂矿山,从事勘测、设计及设备安装等工作。另外,对苏联经验的推崇也起到了相当重要的作用。苏联于 1928 年实施全面的计划经济体制以支撑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并得以建立起强大的国防工业,进而使当时新中国的执政者也认定计划经济下的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是社会主义经济的一个必经阶段。

最重要的一点是,新中国工业化的推进需要资本积累,无法如早期的欧美等资本主义国家通过海外殖民掠夺实现资本的原始积累。另外,在积贫积弱和国际封锁的环境下试图使用市场机制和弱政府规制去启动工业化进程,无疑也很困难。培育强大的国家能力,增强财政汲取能力,实现内源性资本积累

^① 实际上,正式的“一五计划(1953~1957)”直到 1955 年 7 月才由全国人大一届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也就是“一五计划”是在边制边定边实施中产生的。

^② 同样作为亚洲落后国的日本,早在明治政府上台初期,慑于西方的学问及工业成就,明治领导人就提出“富国强兵”的口号,作为治国的优先目标,主要是推动工业经济各种基本建设(安德鲁·戈登,2018)。

就显得至关重要。新中国提前结束了短暂的新民主主义过渡阶段后,用短短三年时间基本完成了“三大改造”,实行公有制和计划经济体制,也由此凭借政府强大的政治动员能力与资源整合能力,顺利地将农业生产剩余大量地转移至工业部门,有利于在有限的资源条件和落后的技术水平下,满足重工业发展对资金投入的需求。相比于 1952 年,在“一五计划”期末,新中国工业总产值增长 128.5%,农业总产值增长 25%,国民收入增长 53%,包括飞机、汽车、重型机器和新式机床等一大批工业从无到有建设起来,宝成铁路、鹰厦铁路和武汉长江大桥等先后建成。可以说“一五计划”任务的超额完成,奠定了中国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基础。

作为后发大国的中国,在内忧外患和百废待兴的现实压力下,选择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比选择比较优势发展战略更具有历史上的合理性,一方面重工业中的国防工业建设巩固了新生的政权,为内外环境的改善提供了制度保障;另一方面,因发展重工业而带动的基础设施建设,解决了比较资源禀赋优势向比较产业结构优势转化所需的贸易可得性问题,从而使得改革开放之后的潜在比较优势能较为顺利地转化为实际的比较优势。因此,对其历史性成就,我们还需要从更多长时间维度去客观审视它,姚洋(2018)评价“改革开放前三十年的经济虽然实行的是计划经济,但是,成就也是不可置疑的。到 1978 年,相较于和中国处在同一发展阶段和收入水平的发展中国家(如印度),中国的工业化程度更深入、工业体系更完善、科技力量更强大、基础教育更普及、预期寿命更高。这些成就为改革开放之后的经济腾飞奠定了坚实的基础”。相反,当时的制度环境并不允许中国采取比较优势战略,政治上的孤立和经济上的封锁使中国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而实行对外贸易的路径几无可能。不同于 20 世纪六七十年代的韩国、新加坡等国家,它们之所以能借助于出口导向战略、发挥比较优势而实现经济的腾飞,很大程度就得益于美国庞大的军援以及来自发达经济体的产业转移,而且小国政治在很大程度上本身就依靠着美国,其消极影响至今仍难以摆脱。对作为落后的大国经济体来说,走独立自主的发展道路显得更为迫切,也为后期的战略转型提供了自主选择空间。

(二) 改革开放后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和比较优势发展战略

1978 年,中国已经从一个完全的农业国变成一个以工业为主的国家,农业和工业增加值占 GDP 的比重分别从 1952 年的 51.0% 和 17.6% 几乎逆转,变为 28.2% 和 44.1%。但为了支撑重工业领域的高投资率,民众承受了巨大的成本,消费率被压至极低的水平,以至于在很长一段时期内,民众都无法从增长中有“获得感”,相比于 1952~1978 年间 6.7% 的年均经济增长率,全国职工的货币工资年均增长率仅为 1.4%^①。这反过来也会侵蚀民众对政权合法性基础的认同,加之高层领导人的相继逝世和政治周期的变更,政权的合法性基础也由政治意识形态合法性向绩效合法性逐渐转换,代之以解放生产力、大力发展经济和共同富裕等相对世俗化的社会信念。同时,国际环境也发生了重大变化,随着 20 世纪 70 年代末中美建交,外交关系的正常化也为东西方全面交流奠定了基础。仅 1978 年这一年,就有副总理一级的干部出访约 20 次,共访问了 50 个国家,尤其是谷牧带团出访欧洲五国,对中国学习西方的技术、观念甚至直接引入外资产生了重大影响,中国开始逐渐融入世界经济体系。制度环境和社会信念的变化诱发了经济增长体制转型,其最大的特征就是通过放权让利逐渐引入并完善市场竞争机制,改进微观经营主体的激励结构,以及通过双轨制渐进性改革引发的生产率竞赛形成的增量改革。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确立“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后,我们的党对新中国成立后三十年的农轻重产业结构严重失衡进行了反思,对“积累与消费”、“生产与生活”、“轻工业与重工业”、“生产结构与资源结构”、“生产结构与需求结构”等多方面的关系、比例进行调整与优化,出台了“轻纺工业优先”、“地区经济梯度发展战略”、“国际大循环”等一系列政策,直至 2001 年加入 WTO 后融入世界经济体系,开始大力发展比较优势产业。其具体的内在机理为: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和乡镇企业“戴帽下”的去集体化推动的农村改革,以及城市国有企业的层层承包制和“抓大放小”,增强了企业和劳动者等

^① 根据《新中国六十年统计资料汇编》相关数据计算所得。

微观主体的经济激励。双轨运行的改革思路为转型期的宏观经济稳定提供了制度基础,价格双轨制虽然在一定时期造成了倒卖寻租和对计划配额的无谓竞争等消极影响,但长期来看市场价格调节机制的引入使得资源配置效率得到大幅度提高。此外,广义意义上的双轨制还包括国有企业和非国有企业的双轨制、特区经济和内地经济的双轨制等。具有“增量”性质的民营企业 and 外资企业与国有企业之间形成了生产率竞赛,使改革过程中的利益关系调整具备“帕累托性质”。特区经济和内地经济的双轨制性质主要体现在,相比于一般的内地地区实行的经济政策,经济特区对土地使用、外资引进和税收政策等方面的优惠,使二者在对行政性资源和政策资源的争夺中同样具备了“竞赛”的性质,同时特区经济的“试验”性质也和内地经济形成制度互补,在产权制度不明晰和市场机制不完善的条件下,中国地方政府在经济转型过程中尽量减少了“试错”成本。不管是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之间,还是特区经济和内地经济之间,在一定时期内都存在制度互补性,更重要的是不同类型的经济组织或经济体制会因生产率不同而产生竞赛,最终生产效率较高的发展模式会诱发地方政府意识形态的偏转,使其制定差异化的经济政策进一步激活地区经济增长的内生动力。

可是,自1960年以来,采用市场经济且实施对外开放的绝大多数国家中仅有11个从中等收入迈入高等收入,尤其是20世纪90年代苏联和东欧国家在引入市场机制后并没有获得经济上的繁荣甚至造成了社会混乱。这就涉及该理论框架的第三个要素——国家能力,因此,有必要追溯改革开放的制度基础及历史逻辑起点。首先是改革开放前的经济遗产,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建立了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基础教育和公共医疗的普及以及伴随工业化发展而培养的简单技术工人使人力资本得到大幅度提高。至1982年中国的成人识字率达到66%,而印度在1981年仅有41%,同时中国的人口出生时预期寿命也由1960年的44岁,提高到1978年的66岁,甚至略高于中高等收入国家的65岁^①。正是早期中国人口较高的识字率和预期寿命,为改革开放后基于比较优势战略的产业选择储备了大量的劳动人口,这是一个人力资本积累和人口红利释放的连续过程。其次,中国经济转型顺利还来自长期制度变迁中形成的国家能力,一方面是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留下来的一系列经济遗产,提高了经济资源的整合能力;另一方面则是计划经济时期形成的强大的基层政治动员能力也成为1978年开始的拨乱反正和1979年启动的农村经济体制改革不可或缺的政治资源,使执政党在制度转轨期的路线、政策和方针能顺利推行和落实(邓宏图、曾素娴,2010)。

因此,从改革开放前后两个时期来理解经济体制变革过程,能较好地认清改革的“二律背反性”。主要是指,1978年的改革是借助于前三十年建立的强有力的政治动员开始,却在后三十年不断降低这种政治动员能力以期建立更强的法治能力。再如,改革是在前三十年通过计划经济体制建立的相对完备的工业体系开始,却在后三十年不断扭转这种丧失部分经济效率的发展模式。改革的“二律背反性”往往使制度变迁的内生动力机制变得模糊不清,而认清这一点,使我们能更好地理解不同发展阶段采取的经济发展战略,以辨清制度转型的内生动力机制。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新中国成立初期的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不是对比较优势战略的违背,其历史遗产构成了改革开放的物质基础和制度前因。虽然随着经济社会的不断深化发展,政府集权式的计划经济体制逐渐显现出激励不足、信息扭曲、效率低下等弊端,但求全责备、指点前贤不是历史唯物主义应持有的态度。秉持辩证法的哲学思维和长远的大历史观,不仅有利于我们客观地评价改革开放前的历史成就,也有利于我们厘清制度变迁的动力机制以及确定未来改革的方向。

(三) 新时代条件下从资源禀赋型比较优势向绿色创新型比较优势的优化调整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中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这既是制度转型的必然要求,也是经济发展的阶段性规律。需要指出的是,在经济高质量发展阶段,并非不要利用比较优势,而是其不断优化调整的阶段。正如蔡昉指出的,作为人口转变规律的

^① 数据来源:世界银行。

必然结果,人口红利终究要消失,长期经济增长必然要寻找更可持续的增长源泉。但是,如果能够在挖掘劳动力潜力和改变抚养比的构成因素,即可以通过更充分的就业、劳动力重新配置和更好的人力资本积累,把数量减少的劳动年龄人口变得更富有生产性(蔡昉,2017)。蔡昉在此处所分析的正是经济增长的第三个阶段,即创新驱动阶段,他称其为超越人口红利阶段,本文则进一步把这个阶段定义为超越比较优势战略的发展阶段。首先,改革开放后约 30 年的高速增长很大程度上来自要素驱动,依靠人口红利、土地红利以及发展型政府的推动作用,出口导向的政策使中国迅速融入全球化分工体系,然而,此种模式带来的诸如环境污染、产能过剩和受制于国际环境波动等问题制约着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加快建设创新型国家是实现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和动力机制转换的必然要求,深层次来说,是对国内外制度环境转变的一个“适应性选择”。

其次,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需要制度转型提供相应的保障。中国深化经济改革遇到的一个问题就是市场与权力相结合,政企关系虽然是中国经济增长过程中的关键要素,但官商勾结下所谓的利益输送,不仅不利于营造良好的营商环境和公平的竞争机制,而且还会破坏法治建设。更关键的是,如果经济发展的成果没有公平地惠及每一个普通民众,这最终会带来民众对政权合法性的“意识形态认同”危机,并影响到经济的转型升级和高质量发展。比如,巴西曾在 20 世纪 80 年代以前取得了经济持续的高速增长,但最终因贫富差距的扩大而导致穷人冲击产权制度,市场经济发展并未带来持续的经济增长,反而在社会冲突之后与其他拉美国家开始陷入“失去的十年”,并至今仍深陷其中。目前中国大力实施的“脱贫攻坚战”以及倡导构建“亲”“清”的新型政商关系,在某种程度上就是对这一趋势的一种回应。因此,高质量发展实质上要求政府转变职能,构建新型政商关系,在此过程中实现国家治理能力和治理体系的现代化至关重要。

最后,从人类可行能力扩展的角度来看待经济发展,也是目前中国经济发展模式 and 制度转型的必然要求。阿玛蒂亚·森(2015)指出“有必要从改善人类生活、增进人类自由的角度来认识增长对发展的促进作用,但是也有必要理解一个国家增长的可能性如何反过来取决于人类可行能力的提升”。也就是说,高质量发展不仅是建立包容性经济制度的必然路径,还需要促成经济持续发展的政治改革,以利用经济增长创造的公共资源来提升人类可行能力。经济增长和人类发展应该是相辅相成的,这是一种双向的关系。阿西莫格鲁指出,包容性经济制度和包容性政治制度是相互支持的,因为政治是社会赖以选择治理规则的过程,而政治博弈中的胜者才能掌控构建社会政策——尤其是经济制度的主动权,其中谁胜出则决定了政治权力在社会中的分配。只有在一定程度的政治集权的同时不失政治权力多元分配才有可能带来包容性的经济制度,国家才能真正成为法律秩序的实施者,并提供相应的公共服务,管理或监督经济活动,从而促进经济的持续增长(Acemoglu & Robinson, 2012)。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又重点讨论了该议题,实质上就是深化经济改革和推动社会顺利转型的内在要求。

五、结 论

历史事件在时间序列里并非是彼此独立的,后期的选择在逻辑上依赖于前期的选择。然而,深受新古典经济学影响的中国经济学界,却常常将改革开放前后的历史割裂开来,甚至因改革开放后的经济制度较为符合主流经济学的理论预期,而忽视改革开放前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积累的重要思想、物质和制度基础。

笔者从制度环境、社会信念和国家能力等要素入手,简要理清了新中国 70 年来的经济体制变革过程,认为制度环境决定了不同阶段的制度选择和演化路径,行为人的社会信念会在对周围环境的感知中做出适应性发展决策,但最终的制度实施及其经济绩效的提升离不开国家能力。具体到中国经济改革的成功,完全不同于西方经济学主流理论提出的“华盛顿共识”的改革策略,再次表明将特定国家经济转型的历史条件考虑进来的重要性,新中国成立后的工业革命有良好的政治动员体系,统一的国家意识

形态,及较为彻底的土地改革,再配合广泛而均等的教育体系和公共卫生体系,使改革开放前工业革命的政治经济遗产成为改革开放后中国经济腾飞的历史逻辑起点。尤其需要指出的是,笔者的分析逻辑和中国的发展经验虽未否定改革开放后市场经济体制的引入对取得经济高速增长的重要性,但纵观两个历史阶段的发展战略,发现国家能力和市场机制的共同作用更能完整地揭示一国经济兴衰的奥秘,更应从权力的绝对性和相对功效探讨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的共生演进,这是需要进一步深入研究的主题。

参考文献:

- 白惠天、周黎安 2018:“M型结构的形成:1955—1978年地方分权与地方工业的兴起”,《经济学报》2018 2:5—46。
- 薄一波 2008:《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
- 蔡昉 2017:《读懂中国经济:大国拐点与转型路径》,北京:中信出版社。
- 陈甬军 2004:“中国为什么在50年代选择了计划经济体制”,《中国经济史研究》2004 3:48—55。
- 邓宏图、曾素娴 2010:“历史逻辑起点的政治经济学含义:1979年前后的中国制度变迁”,《开放时代》2010 9:74—96。
- 林毅夫 2012:《新结构经济学:反思经济发展与政策的理论框架》,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 林毅夫、蔡昉、李周 2013:《中国的奇迹:发展战略与经济改革(增订版)》,上海:格致出版社、上海三联出版社、上海人民出版社。
- 韦森 2013:“探寻人类社会经济增长的内在机理与未来道路——评林毅夫的新结构经济学理论框架”,《经济学季刊》2013 3:1501—1074。
- 2017:《中国经济增长的真实逻辑》,北京:中信出版集团。
- 吴敬琏、马国川 2013:《重启改革议程》,上海: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 姚洋 2018:“中国经济成就的政治经济学原因”,《经济与管理研究》2018 1:3—12。
- 张维迎 2010:《市场的逻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 张五常 2009:《中国的经济制度》,北京:中信出版社。
-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 1993:《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
- 2011:《中国共产党历史》,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
- 周黎安 2007:“中国地方官员的晋升锦标赛模式研究”,《经济研究》2007 7:36—50。
- 阿芙纳·格雷夫 2008:《大裂变:中世纪贸易制度比较和西方的兴起》,郑江淮等译,北京:中信出版社。
- 阿玛蒂亚·森、让·德雷兹 2015:《不确定的荣耀》,唐奇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 安德鲁·戈登 2018:《现代日本史:从德川幕府到现代日本》,李朝津译,北京:中信出版社。
- 道格拉斯·诺思 2008:《制度、制度变迁与经济绩效》,杭行译,上海:格致出版社。
- 2013:《理解经济变迁过程》,钟正生、邢华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 卡尔·波兰尼 2017:《巨变:当代政治与经济的起源》,黄树民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 罗伯特·托马斯、道格拉斯·诺思 2009:《西方世界的兴起》,厉以平、蔡磊译,北京:华夏出版社。
- 曼瑟·奥尔森 2005:《权力与繁荣》,苏长和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 2007:《国家的兴衰:经济增长、滞胀和社会僵化》,李增刚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 中央编译局编译 201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
- 亚历山大·格申克龙 2012:《经济落后的历史透视》,张凤林译,北京:商务印书馆。
- Acemoglu, D., and Robinson, J. A., 2012. *Why Nations Fail: the Origins of Power, Prosperity, and Poverty*. Crown Publishers
- Besley T., and Persson, T., 2009. “The Origins of State Capacity: Property Rights, Taxation, and Politics.”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99(4):1218—1244.
- 2010. “State Capacity, Conflict, and Development.” *Econometrica*. 78(1):1—34.
- Maskin E, Y. Qian and Xu, C., 2000. “Incentives, Information, and Organizational Form.” *Review of Economic Studies*. 67(2):359—378.

Jin H, Y. Qian and Weingast, B. R., 2006. "Regional Decentralization and Fiscal Incentives: Federalism, Chinese Style." *Journal of Public Economics*. 89(9):1719 – 1742.

Walter, H., 1958. *Growth of Industrial Economics*. Manchester: Manchester University Press.

State Capacity, Market Competition and Social Belief: A Political Economic Explanation of the Process of Economic Institutional Transformation of China in the Past 70 Years

Li Kang
(Nankai University, Tianjin)

Abstract: By introducing the concepts of state capacity, market competition and social beliefs, this paper provides a new theoretical framework for understanding the evolution path, influencing factors and endogenous dynamics of the economic reforms in the past 70 years. This paper finds that China's institutional change process is promoted in the interaction of multiple logics such as economic efficiency, political power and social beliefs, and the specific impact on economic performance is subject to the institutional environment faced in different stages of development and the theoretical preference of the ruling party, the country adopted different economic systems and development strategies, and the political and economic heritage of the industrial revolution before reform and opening up became the historical logical starting point of China's economic take-off after reform and opening up. Therefore, "two mutual non-denials in the past 30 years before and after reform and opening up" is the key to fully understanding the changes in the economic system and the reasons for long-term economic growth in China.

Key words: State Capacity; Market Competition; Social Belief; Institutional Change; Economic Growth

(责任编辑: 王政武)